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

——“学习邓小平理论 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下）

主编：袁险峰 姜淑萍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

——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提高党的建设
科学化水平论文集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杨胜群 (1)
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王建军 (8)
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卓 沂 (14)
学习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高 屹 (16)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的几个问题	龙平平 (30)
邓小平晚年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	梁 柱 (43)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条判断标准论的	
重要意义	卫兴华 (55)
为了总设计师的嘱托	
——邓小平理论在广安的实践与探索	王建军 (64)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命运	韩庆祥 (70)
邓小平与新时期党的理论大众化	宇文利 (96)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的理论品质	
——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方 令 (104)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邓小平历史地位和	
作用的再评价	王効民 (111)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周希贤 (128)

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多视角探讨	荣开明 (135)
从思想解放运动看邓小平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理论的贡献	侯 波 (149)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贡献	刘昭华 (161)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几点认识	李平刚 陈田民 (172)
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革命风格	汪玉奇 汤水清 (178)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万建强 (185)
坚持改革不动摇	
——一个值得铭记的话题	王 俊 (196)
论邓小平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	
历史贡献	刘建民 胡 涛 (206)
邓小平与党的基本路线	朱显林 (220)
邓小平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新探	甘庆华 (231)
从邓小平的求实精神看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孙媛凤 (241)
试论邓小平发展观的哲学内涵	刘 毅 (248)
试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党中央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新认识、新决策	何树平 (255)
不平衡发展与统筹协调相结合的辩证思想	
——兼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	陈自芳 (268)
“总设计师”设计中国复兴蓝图的四大着眼点	
.....	曾德强 李 政 (281)
浅谈邓小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贡献	陈 丽 (291)
历史语境与逻辑演进	
——论邓小平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黎 康 (300)
试论邓小平先富后富理论的经济哲学视野	唐光斌 (311)
邓小平与小康目标	何胜凤 (320)
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科学富裕观的理论蕴含	卢根源 (328)
把握邓小平小康理论内涵加快广安农村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广安市委农办 (340)

邓小平“责任制”理念的时代内涵及其价值指向	赖功欧 (355)
试论邓小平分配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意义	刘 慧 陈安年 (367)
略论邓小平 1984 年经济特区之行	蒋永清 (381)
论农业改革的“两个飞跃”与新型合作经济	孙咏梅 (398)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广安市农机事业的变革和发展	龙兴平 (409)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历程及其反思	刘 惠 胡 建 (418)
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道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局面	廖周远 (429)
邓小平与党的思想路线	蔡良志 邓万琼 (438)
邓小平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彭 波 (449)
论邓小平对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	曾 冬 (457)
邓小平对党的制度改革与建设的创造性贡献	包心鉴 (467)
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	邵景均 (481)
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是对党建理论的重大贡献	尹广泰 (493)
邓小平论党的领导	曾 敏 刘 佳 (502)
建设与与时俱进的执政党 ——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初探	毛盛东 (511)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从思想上建党的历史经验	雷 扬 (522)
邓小平发展观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施维树 (530)
坚持邓小平群众观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内在要求	姜 玮 (541)
邓小平“人才强国”的执政思想及其启迪	程伟礼 (554)
新媒体时代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李朝晖 (567)
邓小平的历史方位意识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胡学举 (576)
邓小平转变党的领导方式的逻辑理路论析	邓亦林 (583)
试论邓小平的执政观	唐霄峰 (593)
邓小平 1980 年前后对转变执政方式的形上思考	张曾祥 马春如 (601)

邓小平的包容性执政理念	赵传海 (610)
试论邓小平关于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深远意蕴	
——以邻水发展历史进程为例	朱世权 (621)
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目标思想初探	严世军 (631)
论邓小平对党的执政环境的科学审视	刘 佳 (641)
略论邓小平党史观的核心精神	李培军 (652)
论邓小平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党的建设思想	田苏苏 (660)
过好胜利关 不做李自成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的党建工作	艾新全 (670)
邓小平主政西南的思想探析	田 妹 (682)
邓小平忧党意识探析	赵小波 (690)
邓小平与卡斯特罗党风廉政思想比较研究	
..... 广安市纪委教育研究法规室	(698)
邓小平关于执政党自我改革的思想	陈 杰 (709)
邓小平与政治体制改革	戴安林 (721)
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与初步践行	曾丽雅 (746)
邓小平与苏共领导人政治体制改革比较与启示	
..... 郭文亮 刘兴旺	(759)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思考和实践	张 曙 (773)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与广安人大工作实践	刘凤成 (788)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转变	
的理论贡献和指导意义	王冬霞 罗志华 (795)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论略	陶维兵 (805)
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发展历程	彭兴建 钱箬旒 (813)
邓小平对十二大若干重大理论和决策形成的历史性贡献	
..... 姜淑萍	(821)
浅谈邓小平优秀的思想品质	马 福 (833)
邓小平人生哲学初探	程林辉 (849)
论邓小平学风建设思想	张达刚 (859)

浅论邓小平文风	林厚梅 (870)
浅谈邓小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李 凤 (878)
论邓小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王 琳 (888)
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	钟群英 (906)
实践检验 睿智提升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成因初探	钟明全 (920)
略论邓小平与新时期教育	王锡元 袁 虎 (930)
浅谈邓小平新时期教育思想	陈福钊 (940)
邓小平与新时期教育	侯文莉 (947)
邓小平新时期教育理论探讨	杨小华 (955)
浅谈“三个面向”与发展均衡教育的现实要求	
——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07 周年里	唐光建 (963)
从邓小平抓科技教育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看一代伟人的	
政治智慧	马 旗 (970)
邓小平解决国际战略构想	赵甲明 (976)
战争与和平	
——浅议邓小平和平外交思想	王顺德 (982)
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与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建立和完善研究	邓 虹 (988)
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特点与时代价值	
.....	李志萌 杨锦琦 (999)
邓小平环境保护思想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	段 旭 (1010)
践行小平林业建设思想促进广安森林城市建设	
.....	刘度南 熊 辉 (1022)
邓小平黄山之旅的历史性意义	聂皖辉 (1029)
试论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与黄山旅游业的发展	鲁 敏 (1038)
论邓小平故里红色旅游精品的形成	林 明 (1046)
邓小平旅游思想与广安旅游业发展	李 垚 (1055)

浅析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在红色旅游中的应用

——以邓小平故里为例 杨钟凯 (1064)

试论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 周寅 (1072)

邓小平与新时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王杨鑫苗 (1081)

邓小平旅游经济思想与广安旅游业发展 常玲 (1090)

邓小平民生思想与当代中国民生建设 董一冰 (1098)

改善民生：邓小平思考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维度

..... 单孝虹 (1110)

浅议邓小平以人为本思想 刘静 (1124)

试述邓小平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胡剑 (1133)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采取的就业措施及其作用 邱瑜 (1140)

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群众动员思想探析 吴晓荣 (1152)

邓小平的社会政治稳定理论对当今治国的启示 肖莉 (1163)

深化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稳定观的整体理解 胡长青 (1174)

邓小平危机管理思想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裴亮亮 (1182)

邓小平多党合作思想研究 张叶婷 (1192)

邓小平对新时期统战理论的贡献 梁晓宇 (1201)

邓小平理论的宗教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论的形成

..... 马文慧 (1214)

论邓小平理论对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

..... 周全德 李怀玉 (1224)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

——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提高党的建设
科学化水平论文集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图书馆

邓小平的包容性执政理念

赵传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在深入探讨和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规律，推进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改写了革命范式的排他性执政理念，确立了建设范式的包容性执政理念，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创新和执政地位巩固作出了卓越的积极贡献。

一、邓小平倡导包容性执政理念的多重原因

世界上鲜见一因一果的单纯关系，往往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的复杂关系。构成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不能自以为是、独立发展，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邓小平倡导和推行包容性执政理念，同样是这个时代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认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门槛，以“立”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取代了以“破”为特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以苏联为鉴，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革命思维定势和历史路径依赖等众多主观、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完成灵魂深处的根本转变，而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进而酿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苦难悲剧。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到“斗争哲学”应该休息，“和合哲学”应该上演，强烈地期盼“瞎折腾”状态早日结束，“谋建设”美景尽快到来。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指出：“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①摧毁一切、葬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既破坏了社会生产，也消损了党的执政资源，党群关系趋于紧张，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出现了危机。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的到来，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深切地认识到，必须转变思维方式和执政方式，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一切可以包容的因素。革命时代，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斗争的排他性占据上风；建设时期，执政党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社会资源，建设的包容性势在必行。

第二，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形势的客观需要。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到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新时期。如果说之前的建设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话，那么由封闭而带来的建设要素的单纯性则是不言而喻的，在思维方式上同样助长了片面性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要求党的执政理念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历史转折之后的中国，古今中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空前活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多态化、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元性、多变性，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面临诸多新矛盾、新课题。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高瞻远瞩，统筹兼顾，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执政合法性，关系到执政有效性。经过审时度势，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果断地选择了广泛包容的价值。

第三，中国传统包容性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华文明是多源一体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融合、传承、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兼收并蓄的内在品质和包容万物的文化传统。《周易》中的两句名言，在某种角度和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反映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后者反映了包容万象的特质。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乡间百姓，在论及世道和个人修养时，常常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勉，即应有宽容心态和包容气度。中华民族的这个优良传统，对任何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而言，都是人生的法度。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① 尽管“五四运动”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演了“破除四旧”的闹剧，但是优秀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总是在中国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灵魂深处留下潜在的烙印，潜在地规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考察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现状，我们便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个体和整体中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承载和内聚着中国的文化基因。反过来讲，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发展，始终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② 中国共产党只是在表面上与中国文化传统实行“彻底决裂”，实际上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弘扬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样，“邓小平是深受传统的熏陶、对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3页。

② 赵传海：《文化基因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民族传统具有浓厚兴趣的伟人。”^①邓小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营养,获得了可贵智慧;中国文化固有的精髓被邓小平灵活运用,实现了创造性转换和时代性升华。

第四,邓小平丰富经历和伟大品格的内生作用。邓小平的一生阅历丰富、经历坎坷,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西洋文化的影响,“三落三起”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受到党和人民的褒奖和拥戴,也饱尝了人间的艰难和苦涩,练就了他能够坦荡包容的伟大品格。胡锦涛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邓小平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为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革命风格。邓小平目光远大、襟怀宽广,始终站在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的发展战略。邓小平的经历和品格,让他能够比其他人更加清醒地看准和把握“三大规律”,由博大胸怀产生宽容态度,由宽容态度选择广泛包容,因而倡导和坚持了包容性执政理念。

二、邓小平主张包容性执政理念的多重表现

邓小平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包容性执政理念”的概念,但在他的言行中,则有浓郁、丰富、深邃、明确的显示和表示。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方方面面对这个世纪难题进行了初步回答。他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认为,革命行为和建设行为具有本质的不同,革命往往表现为“破”,建设往往着眼于“立”,“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

^① 李方祥、郑崇玲:《邓小平与中国传统文化探魅》,《黑河学刊》2001年第4期。

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在邓小平看来，党在执政时期不能完全沿用革命时期那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必须以“立”为价值取向，超越排他性的革命范式，坚持包容性的建设范式，转变执政理念、巩固执政基础、扩大执政资源、改善执政方式，增强执政能力。

第一，党的队伍发展要有包容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邓小平看来，建设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革命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因为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明确地表明了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①既然如此，那么中国共产党就应该从新的实际出发，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着力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一，就党员队伍而言，邓小平主张把社会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不断壮大党的队伍。早在党的八大时期，邓小平就敏锐地认识到，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党的组织，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党员成分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必须“使党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其二，就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而言，邓小平坚持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是中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也是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其三，就党群关系而言，邓小平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求密切联系群众。邓小平强调，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党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看待群众的思想觉悟方面，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邓小平还指出，要客观地承认其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犯罪坚决采取法律措施。党不仅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且要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奋斗。争取人民群众认同的价值取向，确立了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本源问题；团结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主张，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在执政路径上的广泛包容性。

第二，党的理论创新要有包容性。邓小平留给世人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首先，邓小平理论具有非常广泛的包容性。从结构来看，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从内容来看，它弘扬了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观念，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坚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权衡具体对象的利弊，宽容其瑕疵，利用其益处。比如在对待外资的问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其次，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样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即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为主导的包含多种社会成分的历史发展阶段。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具有主体突出、导向明确，同时兼顾多个向度的表述，不仅包容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个方面，而且在每个方面又包容了诸多互相矛盾或互相支持的对立面。所有这些，既排除了指导思想上的片面性，又拒绝了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

第三，党的方针政策要有包容性。邓小平在关于方针政策的众多论述中，体现出了超常的智慧，把一般人认为不可能兼容因素或要素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综合创新。一是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改写了国内外普遍认同的“市场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的旧观念、旧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就是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巩固和坚持按劳分配的同时，鼓励和规范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承认和允许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剥削存在。二是在政治方面，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纲领。人民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本身就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三是在文化方面，邓小平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发展“三个面向”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三个一定要”的方针，即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三个方针的本质是文化民主，即是多样性、多样化的文化生态。四是在祖国统一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付诸实践，取得了成功。五是在外交方面，邓小平提出了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坚信“东风压倒西风”，基本上处于对外隔绝的状态。20世纪末，鉴于国际形势“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现实，邓小平强调，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求同存异、谋求合作，推动和构建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第四，党的奋斗结果要有包容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既不取决于道统，也不取决于权威，最终取决于绩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时刻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因此，党的领导人总是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为了确保党的执政地位，必须通过党的建设带动党的事业发展，通过党的事业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这一辩证关系中，党的奋斗必然产生多方面的结果，不管这些结果如何，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就应该积极支持和大力促进。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强调，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他举例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就是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支持实践、善待结果。这种对党组织、党员奋斗过程、奋斗结果的宽容与包容，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可想象的。

三、邓小平确立包容性执政理念的多重意义

包容，既是一种心态、气度和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提出和推行包容性执政理念的人，必然是大气度、大胸怀的伟人，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文革”之后，“邓小平没有去算历史旧账，也没有去计较个人恩怨，而是把握住了大局的分寸，把握住了政治的分寸，把握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寸”^①，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力拨乱反正、开创局面。邓小平倡导和推行的包容性执政理念，把握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能力建设中最基本、最普遍、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内在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国家的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和阐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列宁虽然领导苏联共产党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是严格来说，还没有完成革命任务就去世了，因而也不可能深入探讨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斯大林、毛泽东虽然经历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摆脱革命党的思维定式，在工作方法上依然奉行“斗争哲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早在中共八大会议

^①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76—477页。